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遭遇发展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 (Arturo Escobar) 著

汪淳玉 吴惠芳 潘璐 译

叶敬忠 译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遭遇发展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著

汪淳玉 吴惠芳 潘璐 译

叶敬忠 译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美)埃斯科瓦尔(Escobar, A.)著;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097-2214-5

I. ①遭… II. ①埃…②汪…③吴…④潘… III. ①第三世界—研究
IV. ①D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9610 号

遭遇发展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著 者/[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

译 者/汪淳玉 吴惠芳 潘 璐

译 校/叶敬忠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张晓莉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吕伟忠

项目统筹/宋月华

责任印制/岳 阳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刷/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20 印 张/19.2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328 千字

印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2214-5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图字 01-2010-7977 号

定 价/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Copyright ©199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

中译者序*

叶敬忠

人们在憧憬未来时，常常高唱“主动选择，把握人生”的豪言壮语；而在回首往事时，却又每每发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慨叹息，因为很多时候个人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原本学习自然科学，几经辗转，又入了社会科学之门，但40余年的人生路途中，我的生活世界似乎一直没有离开“发展”二字。小学时的每篇作文都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结尾；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科学至上主义指导下，大学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学习土壤化学，也为的是以实际行动投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硕士阶段学习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孪生兄弟——发展规划，即如何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随后便投身于在中国实施的大量国际发展合作援助项目。有着这样的成长经历的一代人，也许怎么也不会对现代化发展道路产生半点疑虑。即便是博士期间学习的发展社会学，也没有脱离发展干预这个主题，只是在以往关于发展的线性思维中加入了冲突的视角，认识到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在发展干预过程中的不连续性。其间虽然知道著名学者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的《遭遇发展》，但由于语言和理解能力所限，未能太多关注。直到2007年与作者相遇，并正式投入该书的中文翻译工作，才发现所译内容竟是对自己以往所形成的发展思维和发展工作经历的彻底颠覆；震撼之余，我深为作者的思辨深度所折服。作者令我为译著作序，我自知力所不逮：作者深谙人类学、哲学和政治学，即便对于受过系统社会科

* 该文涉及本书内容和思想的介绍文字很多出自原书，但因摘自书中的很多不同部分，因此没有一一标注页码。

学教育的科班译者，也得费上一番工夫，遑论一个教育经历杂乱无章的人了。然而，既自称是用心逐译，或许可以摘下些许学习笔记和心得，待与读者求异存同。

另外，就在本书中文版即将付梓之时，适逢国际发展界的一件大事发生，即以 GDP 总量为标准，中国在 2011 年 2 月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祖国的百年复兴，大国之梦。在国人欢欣鼓舞，大庆增长盛世之时，推介《遭遇发展》，似乎有点不应时，不应景。但是，也许，此时正是出版该书的最佳时刻，因为很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般与经济的繁荣相伴相随的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在中国的辉煌和风光背后，也有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不公平、贫富悬殊、资源耗竭、管理危机、社会风险、贫困固化、生产不安全、群体事件频发等一系列尖锐问题。因此，越是在享受饕餮盛宴之时，越应该保持冷静与清醒的头脑，正所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发展的诞生与普世化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许都不会不说自己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奔跑，虽然有的慢些，有的快些，但对旅途选择和前进方向均认识一致，也该算得上志同道合了。这种发展的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要途径，以英美为效仿和赶超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选择并无二致。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积累迅猛，经济建设成就斐然，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虽然对国家发展政策和发展计划也有各种讨论，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农业支持工业，还是工业反哺农业，无论是城市化道路，还是新农村建设，无论是又快又好，还是又好又快，这些讨论的话语场域均为发展，不同的只是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会倡导另一种发展罢了^{〔1〕}。人们对现代化发展的选择坚信不疑。

然而，埃斯科瓦尔通过对二战后的世界发展战略进行知识考

〔1〕 叶敬忠：《发展、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第 5～8 页。

古学分析发现,“发展”并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发展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规模的贫困现象才开始被西方“发现”,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地区成为了“欠发达”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在194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是二战后衍生出来的话语产物,而发明这些概念的西方国家将此视为重新界定自身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作原则,其目的是将穷人和第三世界变成其知识和管理的对象。全球贫困的问题化带来了制定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理念与标准的新战略的需要。特别是1949年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经济重建中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贫困之类的远程问题上。新战略认为消除贫困的方法就是经济增长,因此,发展就成了不言自明的通用真理;现代化是唯一能够摧毁陈旧的价值和制度的力量;工业化和城市化被看作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人们对资本和科学技术顶礼膜拜,而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被看成是愚昧无知的。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不容置疑地成为亚非拉地区仿效的榜样。此时,发展战略成为将世界标准化的工具。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提出的美国全球战略的“第四点计划”就是这种新战略的具体体现。这种二战后为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殊利益而产生的特定历史产物被当成世界人民分享和平和富足的梦想,世界各国也都争相拥抱这一梦想。但其后40多年的发展结果是,发明这些新战略的理论家和政客们许诺的富足之国并未出现,相反,发展战略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社会不平等,是日益增多的营养不良和暴力事件,这些是霸权式发展战略和现代性思潮失败的标志,第三世界的人民群众对它也越来越抵触^{〔1〕}。

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发展的专业化的过程,在第三世界引入专家知识和西方科学,通过一套技术、策略和学

〔1〕 摘自本书。

科实践来生产、确认和传播发展知识，包括学科专业、研究和教学方法、专业标准以及多种专业实践。发展的专业化是通过发展科学和分支学科的繁衍扩散而实现的。在发展专业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大部分知名大学开设了发展研究的课程项目，第三世界国家也以此为条件创办或调整了大学结构以适应发展的需要^{〔1〕}。在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以专业的形式于1988年被正式引入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是发展的专业化过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发展的“社会转型说”、“干预行动说”和“西方话语说”

在那些设有发展专业的大学里，面对如饥似渴的求知者，我们经常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回答“什么是发展”。根据安迪·萨姆纳和迈克尔·特赖布（Andy Sumner and Michael Tribe 2008）的总结^{〔2〕}，“发展”有三种定义。

定义一，发展是指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可简称为发展的“社会转型说”。这一定义看似价值中立，其实质离不开冷战期间的一种“元叙事”和社会转型的宏大蓝图，即对现代化的渴望和“欠发达”地区的解放，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尤其是指它们选择的通向工业化社会的路径。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实践证明，这种元叙事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倡导现代化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大多使用这一定义。

定义二，发展是指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的活动，可简称为发展的“干预行动说”。这一定义显然较窄，带有鲜明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和强烈的工具性。例如，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反贫困行动均属这里所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其目标往往偏离广大民众的期望，而变成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的需要，真正的目标人口常常不能从发展中受益。尤其是，这种脱离历史

〔1〕 摘自本书。

〔2〕 Sumner, Andy and Michael Tribe. 2008.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p. 11-16.

背景的技术专家统治的发展，回避了财富积累和分配的社会过程，从而达到了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所称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效果〔1〕。国际多边和双边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发展项目职业工作者（基层实践人员、技术专家等）和为了发展项目的行动研究者多使用这一定义。

定义三，发展是指西方现代性的统治性话语，可简称为发展的“西方话语说”。这一定义与前两种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是指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强加给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地区，因而导致了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很多后现代的理论家和反全球化的行动者坚持这一定义，包括埃斯科瓦尔、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马吉德·拉纳玛（Majid Rahnema）和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等，而埃斯科瓦尔对这一定义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本书就是对这一定义最为全面和最为彻底的诠释。

对“西方话语说”的理解〔2〕

二战后，发展的本质一直是有关亚非拉地区的讨论的主题，寻求一种可以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展是理论家和政客们的重要议程。整个社会对此深信不疑，即使反对主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人也承认需要发展。人们可以批评某个既有的发展模式，对它做出修正或完善，但发展本身以及人们对发展的需要，从未被质疑过。各国政府都在规划和实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各类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和农村实施各种发展项目；各类专家都在研究欠发达现象并创造理论。对此，埃斯科瓦尔心存疑惑。

当代法国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

〔1〕 Ferguson, James.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54-256.

〔2〕 本部分内容均出自本书。

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提出的话语分析方法使人们可以对这类“现实殖民”进行分析。面对人们从未怀疑的、司空见惯的现实, 话语分析可以使研究者“后退几步, 绕过现实, 去分析它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1〕, 这样就可以“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2〕。话语分析工具恰好是为了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给出解释, 即某些表征如何占据了支配地位, 如何永无休止地塑造着现实被构想和被作用的方式。对社会现实表征中话语和权力的分析尤其有助于揭示某些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 某种话语秩序能够生成一些被允许的存在与思维方式, 同时压制甚至抹杀其他方式。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默丁比 (V. Y. Mudimbe) 和钱德拉·莫汉蒂 (Chandra Mohanty) 分别将福柯的这些思想与分析方法运用于东方主义、非洲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研究, 取得了大量著名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表明, 我们的社会现实已经被话语所殖民, 我们对周围被建构的存在不再怀疑, 我们生活在被殖民了的社会现实的桎梏与束缚之中。

而埃斯科瓦尔则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发展研究领域, 对控制和统治社会的发展体制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剖析和批判。埃斯科瓦尔指出, 应该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 一种历史的产物。当西方的专家和政客们开始把亚非拉地区的某些情况看作是问题, 将其中大部分问题视为贫穷和落后, 并将亚非拉地区按照西方的概念和标准表征为第三世界和欠发达时, 一个新的思维和行动领域, 即发展, 就此诞生了。因此, 应将发展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来考察, 对发展的分析就是对其表征体制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描述发展的知识形式、控制发展实践的制度和权力体系以及由发展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形式才能厘清发展的含义。也就是说, 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

〔1〕〔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 余碧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第 107 页。

〔2〕参见 (唐)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论“雄浑”的话。

话语开始运行的，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只有特定的事物可以被言说，甚至是被想象。

埃斯科瓦尔对二战后主导了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路径的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文化批判和话语分析。他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出现不是由于认识、理论、制度或者方法论上的进步，而是由于某一个历史局面改变了经济话语的存在方式，从而为新目标、新概念和新方法论的建立创造了可能性。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经济学远不是实践者所预想的客观而普世的科学，它就像任何一个全球的或本土的模型一样，只是对世界的一种建构，而并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真理。发展经济学的话语始终处于不断制造现实的动态变化和转型过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永远是为了西方发展话语的整体需要，是为了维持西方发展体制的霸权主义支配体系。例如，二战后初期，配合着将“欠发达”的第三世界贫困问题化的需要，“将贫穷国家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贫困之中拯救出来”这样的“贫困与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欠发达的经济学”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而到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 20 世纪 80 年代，“亲善市场的发展”则变成世界银行在 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大力拥护的改革战略。而在发展经济学向新自由主义正统回归的过程中，理论家们宣扬，不要为人民的生活标准下降到史无前例的最低点而担忧，这只是进行结构调整时暂时需要付出的代价，此时，人民的福利被认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哪怕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另外，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转变过程中抛弃了增长和分配这些概念，摒弃了劳动价值论，剔除了分配问题以及阶级和财产关系的问题，将完全竞争和完全理性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再者，在处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家根据权力集团的统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对知识和科学工具的运用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唯有是否心手相应令人生疑。埃斯科瓦尔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一切话语和话语形变完全是为霸权阶级的利

益服务的，尤其是美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种种急务形塑了发展经济学的性质。而第三世界的决策者们也急于喝到经济知识的圣水，好一劳永逸地让他们的人民达到文明的程度，从而实现统治的目的。

虽然理论家们研究了发展理论形成中的各种因素，如资本、技术、人口、资源、财政、产业、教育、文化、组织等，但发展不单是对这些要素加以简单综合的结果，发展是这些要素、机构和实践之间建立了关系后的结果，是将这些关系系统化为一个整体的结果。发展话语能够系统地形成它所讲述的事物，并以某些方式将这些事物分组安排并赋予它们整体性。正是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使对象、概念和战略的系统化建立成为可能，它决定了在发展的范畴内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什么是可以言说的。这些关系建立起了一个话语实践，为游戏制定了规则：谁拥有发言权，从哪些角度发言，具有什么样的权威，根据什么专业标准来判断。人们必须遵循这些规则来认识问题、建立理论、对事物命名、进行分析，并最终转化为一项政策或计划。因此，人们，特别是各类专家，不断地发现问题，不同类别的需要服务的对象开始出现。发展正是通过话语生产了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发现和制造了“异常”（如“文盲”、“欠发达者”、“营养不良者”、“小农”、“贫困妇女”），从而令世人坚信需要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处理和改造，也就是使他们变成发展计划和发展项目中“被发展的群体”，而其中隐含的正是第一世界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一整套话语组织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埃斯科瓦尔将国际组织和国内机构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而规划和实施的各种发展计划和项目（亦称发展干预）作为载体，分析了发展话语通过实践得以运用的过程，特别是发展话语通过实践进行的扩散以及发展干预行动所生产的相互关联的知识类型和权力形式。在发展干预过程中，发展机器通过将理性技术、专业知识和制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和权力的组织，进而将政府官僚、各类专家和第三世界的“受益人”

联系在了一起。通过特定的话语组织、制度实践和文档现实的创造，发展机构的日常实践很多被认为是理所应当而且司空见惯，但是这些日常实践并非是完全理性或中立的，事实上，比发展干预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机构的日常实践促进了社会关系、劳动分工和文化形式的形成，并有效地制造了不为人觉察的权力关系。通过文档实践、标签化等表面上理性，实质上政治的知识过程，“被发展者”被发展机器和发展专家所建构，并按照发展机器和发展专家眼里的世界再造一个世界。可以说，发展干预就是一种官僚政治，因为它致力于管理并转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和组织的方式。所以，那些貌似理性和中立的发展话语体制，其实是现代世界权力实践的一部分。发展机器正是依赖这些实践实现了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支配和统治。

在发展干预最为常见的农村发展、妇女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发展话语通过全景敞视将农民、妇女和环境置于发展机器的有效凝视之下，从而使得农民、妇女和环境成为展览品，成为发展要服务的对象。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等发展组织的话语实践见证了建构农民、妇女和环境的表征体制基础，展示了表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干预中，规划师和专家运用表征，并通过表征，使发展被赋予可见性，在此过程中，发展话语创造的可见性与权力行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像福柯谈到的监狱，它在实现改造犯人这一明确的目标上是失败的，但它却成功地生产出一个规范化的、规训了的社会。发展话语将人们定位在一定的控制坐标上，其目的不仅仅是驯服一个个个体，而且也要将人们的生活环境转变为一个高产的、标准化的社会环境，即要创造出现代性来。在此意义上，发展机器通过技术化凝视呈现出显著的生产力：它不仅进一步稳固了国家的地位，而且将它应当解决的很多问题去政治化了，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从而可以托付给发展专家来进行理性决策和管理。

发展话语在二战以后操控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表征政治和身份政治，成为核心的、无处不在的话语。而宣称

为真理的各种发展话语与创造并控制社会生活的各种实践和符号相联系，通过知识和权力的结合，创造、控制并统治着“欠发达”地区以及那里的人民。发展构造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和力量，新的发展语言从中找到了依靠和支撑，这就是发展取得的成果。

埃斯科瓦尔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话语所进行的解构和批判可谓淋漓尽致，他告诫人们不能被西方发展话语搽在表面的盗名欺世的粉脂所诓骗，其实，发展话语一直最排斥的，也是发展应该围绕的中心，那就是人。它把人和文化看作是抽象的概念，看作是在“进展”这个图表中可以上下移动的统计数字。发展成了第三世界文化的毁灭者，更为讽刺的是，它竟然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的旗号。

在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批判基础上，埃斯科瓦尔探讨了发展表征体制的转型问题，他指出，改变话语秩序是一个政治问题，它需要社会行动者的集体实践和对既有的真理政治的组织进行重构。对于发展来说，这尤其需要从发展科学中抽身出来，以及部分地、策略性地脱离常规性的西方一般认识模式，以便为其他类型的知识与经验腾出空间。例如，在现代性危机下，拉丁美洲等地区出现的“混杂文化”应该成为文化肯定的模式。而对于替代方案，埃斯科瓦尔认为，我们不应该期冀寻求宏大的替代模式和替代战略，而需要考察在具体环境中可能的替代表征和替代实践，尤其是，这些替代表征和替代实践存在于混杂文化、集体行动和政治动员的背景之中。而对替代方案的探索归根结底在于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包含了改变表征政治的可能性和改变社会生活本身的可能性。从混杂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第三世界人民的实践策略和抵制发展干预的多种形式中，可能会涌现出建设经济、解决基本需求问题以及组成社会群体的其他方式。在此基础上，构想一个具有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的后发展时代。

“社会转型说”、“干预行动说”和“西方话语说”之间的联系

以上用了较大篇幅展示埃斯科瓦尔在本书中对“发展”的第

三种定义的诠释。现在我们应该再次回到“发展”的三种定义。在学习埃斯科瓦尔论述的“西方话语说”之后，我们发现，这三种定义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彼此之间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利益渊源。可以说，“社会转型说”是现代性的特殊变体，是二战后各国对北美和欧洲（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价值选择，其中包含了“人性解放”和“生产力解放”的元叙事。而“干预行动说”则是“社会转型说”的帮手，就如发展经济学与发展规划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孪生兄弟，是将理论家和政治家的社会转型蓝图具体化为社会实践和具体行动的过程。而“西方话语说”则是建立在对“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的研究和分析基础上的，正是由于对二者的解构和批判，才形成了“西方话语说”；因此，若没有此二者，则“西方话语说”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话语说的发展定义”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用语。从前面对本书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埃斯科瓦尔在本书的第二、三章中对发展的发明和经济学学科变迁的分析正是对“社会转型说”的有力批判；而第四、五章对综合农村发展、妇女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分析，以及对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等发展机器的日常实践的制度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分析，正是对“干预行动说”的彻底解构。

在社会学和哲学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看成是结构功能性的，是现代性的发展主义，强调的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以及对社会的支配和控制；而“西方话语说”则是后结构主义的，是后现代的后发展主义，强调的是去中心的多元混杂模式的共存和各种形式的抗争。这三种定义可以同代并存，但我们不能将它们仅仅看成是一般的学派之争，而应该看到这三种定义背后的知识体制与权力运行，以及分别倡导这三种定义的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价值差异。按埃斯科瓦尔的分析，“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正是发展话语的发明和运用的结果，其真正关注的并非“贫困”、“欠发达”和那些被置于全景敞视下的“被发展的群体”，其真正的目的是种族中心主义，通过催生技术

专家治论思维而将社会问题去政治化,从而维护并扩张本身已处于中心的西方的进一步的权力霸权。而“西方话语说”的权力取向则是对现代性霸权和中心主义的抵抗,为差异政治和文化肯定争取空间。福柯指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1〕}就分别倡导这三种定义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除了分别从事不同的事业领域并参与其权力生产之外,他们的认识论与价值也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性质。倡导“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的知识分子(若还可以使用知识分子一词的话)一般属于葛兰西所指的有机知识分子,福柯所指的特殊知识分子,或国内习惯所称的体制知识分子;而倡导“西方话语说”的或许更接近于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2〕},福柯的普遍知识分子^{〔3〕},或国内的非体制知识分子^{〔4〕}。若进一步思考,我们也许会发现,倡导前两种定义的学者不一定接触过或了解第三种定义,其主要原因不一定在于知识面的限制,更多是因为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唯我独尊和不开放态度,除此之外,也许不乏昏睡未醒者。相反,倡导第三种定义的学者一定对前两种定义的内涵已然洞晓,本书作者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学者的思想与其人生经历常常是密不可分的。本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埃斯科瓦尔对自身经历的不断反思和不断否定的结果。他于1975年在哥伦比亚瓦莱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7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食品科学与营养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1〕〔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2〕〔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1页。

〔3〕〔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441～442页。

〔4〕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9页。作者将知识分子分为体制知识分子、非体制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我认为后两种均可称为非体制知识分子。

1987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发展哲学与政策计划专业博士学位。我虽然不能与埃斯科瓦尔比肩学术成就，但是也许可以“精神胜利一点”的是，我们的经历原来如此相似。若以我之思想变化来揣度，至大学，埃斯科瓦尔的世界观也是技术与工程至上的技术治国论和现代化思维，这与发展的“社会转型说”应该是一致的。他毕业后留校工作了一年，此后获得 PAN/DRI（国家粮食与营养计划/综合农村发展项目）奖学金，学习食品科学与营养专业，回国后还为国家粮食与营养计划工作了 8 个月的时间^{〔1〕}。这段经历正是当时的国际发展新战略背景下的发展专业化的结果。可以说，他对发展的“干预行动说”也具有亲身的经验和体会。因此，在博士学习之前，埃斯科瓦尔恰好经历了发展的“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的思想历程。而这种切身的体悟是他在思想上和世界观上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的基础，这与他发展的发明和发展干预的分析一样，构成了其“西方话语说”的理论基础。

后发展主义与混杂模型

在本书中，埃斯科瓦尔将二战后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发展干预行动和发展机器解构得支离破碎，最后他提出要摧毁发展，构想一个后发展时代。我认为，作者所批判和要摧毁的是一整套的发展话语体系，包括发展话语所控制的表征体制，发展话语所生产的真理体制，话语实践所制造的秩序体制，发展话语体制所实现的对发展对象的客体化凝视，以及发展话语所实现的西方对

〔1〕 PAN/DRI 奖学金的经费来自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而我自己在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了 3 年，后获得 CIAD（中德综合农业发展项目）奖学金（经费来自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前往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学习区域发展规划与管理研究生课程，简称 SPRING。该课程由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资助，自 1981 年开始设立，目的是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发展规划的人才，目前仍在继续。埃斯科瓦尔参加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研究生课程也是在国际发展新战略背景下发展专业化的组成部分。